

“海外中国新移民”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周大鸣 陈 雪

内容提要 “海外中国新移民”是指 1978 年后从中国大陆移居海外的群体,对国际经济发展和世界文明互鉴具有一定影响力。国外研究多利用量化手法,在公共卫生、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进行广泛讨论,成果丰硕;国内研究善于整体性梳理群体“新特征”,并通过田野调查了解他们在不同移居国的生存、发展规律及其影响。国内学界可以在吸取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通过对研究理论、地域、方法、内容等进行革新与拓展,为中国更好地处理和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丰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案例。

关键词 海外中国新移民 人口流动 国际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

在世界移民浪潮中,海外中国新移民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他们不仅给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带来影响,更反映了国际秩序调整、世界格局变化等全球议题。海外中国新移民指 1978 年后,从中国大陆迁居国外约一年以上,具有中国国籍或加入所在国国籍的中国人(不包括政府派遣的外事人员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移民)。他们在全球上百个国家和经济体中广泛分布,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与影响。

海外中国新移民的历史与现状,与新时代华侨华人研究有一定关联;前者所涉及的区域研究,也与国际政治、文明互鉴等密切相关。自 20 世纪末开始,海外中国新移民逐渐成为国内外学界讨论的热点。虽然新移民所涉及范围之广、群体之多,但是暂未有大规模的调查来准确把握其结构特征与资源优势;已有的宏观研究,往往借用各国报告和政策来推演而不够深入;部分研究带着理论预设与理解偏差,结论也不够全面。当前,随着海外中国新移民的作用与影响愈加明显,对它的研究也从单纯的群体研究,走向复杂的多维研究。就国内学者而言,急需从国际政治、文化、族群心理等复杂议题中总结经验,准确认识海外中国新移民的角色与定位,并且推动知识生产快速转向世界高度。

本文借助 CiteSpace 知识图谱分析工具,^①分别梳理国外和国内研究的主要议题,从中总结异同,然后在吸收国外研究经验的基础上,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发展出一套符合国际形势和中国国情的研究方案,以期推动国内学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移民研究对话,为中国更好地处理和解决相关问题,提供较为全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案例。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移民海外聚居点调查研究与动态数据库建设”(项目批准号:23&ZD206)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CiteSpace 是目前常用的绘制知识谱图的软件,具有关键词共现、发文机构分析、文献耦合等可视化功能,可以动态展现时区分布、节点大小和研究热点动向,以此分析学科现状与发展趋势。本文采用软件版本为 CiteSpace6.3R1。

一、国外研究的现状与评价

海外中国新移民受到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首先,国外是海外中国新移民的接收国,庞大的群体在这些国家产生了较大影响,自然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并且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天然地关注在本国生活的人群情况;其次,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外学界出于对中国发展的热切关注,也期望透过海外中国新移民的研究来认识、分析中国。

(一) 国外研究的总体情况

为保证国外研究文献的分析准确,我们选择外文文献检索来源为 WOS(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检索式:TS = (New overseas Chinese immigrants) or TS = (New Chinese Immigrants); 文献类型:“ Artical ” and “ Review Artical ” ; 为研究便利,将语种选择为 “ English ” , 截止时间设定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然后对检索出来的文献进行人工筛选,共得文献 720 篇。最后导出文献并转换导入 CiteSpace 软件中,对文献进行转码和拆分处理,绘制文献计量分析结果,为探讨国外研究议题提供方向。

从发文量呈现来看,WOS 数据显示,总体发文呈稳步上升态势,检索到的最早文献发布在 1991 年,21 世纪前后是一个分水岭。21 世纪以前,发文量较少。21 世纪以后,才逐渐将其看作是一个群体并有了分析性研究,尤其是 2010 年以后,相关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从作者单位所在国来看,前几名依次是美国、中国(大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新加坡。美国的发表文章数量排名第一,为 396 篇,远远高于中国(大陆)的 116 篇。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非英语类文献没有纳入分析范畴,这部分内容有待另文详述。

从发表文献所属专业来看,集中在十余个专业领域,跨度较大。其中,排名靠前的专业是公共卫生学、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心理学、老年学等,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研究文献占到过半的比例,尤其是医学人类学作为跨学科的视角在国外研究中被广泛运用,值得注意。

图 1 1991—2023 年国外研究海外中国新移民的关键词共现图^①



^①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基于上述分析,再进一步厘清国外研究的主要议题,我们将借用关键词共现分析的方法。通过CiteSpace软件将分析对象设置为“key words”,时间节点为“1 years”,共现频次为“ ≥ 15 ”,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图1)。

由图1可知,出现频次最高的前十五位关键词依次是:“chinese”(64次)、“immigrants”(52次)、“acculturation”(45次)、“migration”(43次)、“health”(40次)、“chinese immigrants”(40次)、“united states”(36次)、“identity”(24次)、“asian americans”(23次)、“adults”(23次)、“care”(22次)、“prevalence”(22次)、“mental health”(20次)、“american”(19次)、“social support”(19次)。结合这些关键词反映的研究范畴,与上述文献所属的专业情况来分类,可以发现国外研究的主要议题有以下三类:一是生存、融入和认同等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极为关注;二是疾病、卫生等医学方面的自然科学领域;三是精神健康、老年照护等跨学科综合领域。

(二) 国外研究的热点议题与创新视角

首先,国外研究对海外中国新移民的“族裔”“种族”等议题比较关心,形成了关于生存策略、社会融入与文化适应等方面的讨论。多数国外文献注意到了他们在语言、职业、教育等方面采取的手段和措施。学者们较早地采用社会学“社区研究”的方法,形成了“唐人街”研究范式。在早期,外国学者习惯将唐人街定义为相对于主流社会的“贫民窟”和“藏污纳垢”之处,是充满光怪陆离景象的“种族飞地”。直到20世纪末,研究观点才有所转向,不少华裔学者试图打破这种立场预设。例如周敏对“唐人街”保持了持续关注,认为这种“族裔聚居区”在帮助他们向上流动的过程中起到极大作用。^① 近几年,海外中国新移民在郊区建立了新式唐人街,他们一方面保持着族裔经济模式,另一方面也塑造了一个新的模范刻板印象。也有国际学者从文化接触视角出发,进行量化研究,将跨国婚姻、宗教参与、娱乐参与等有可能发生文化接触的场域一并考虑,然后对结果进行数字化分析和比较,以此来阐释海外中国新移民作为少数族裔被“同化”的过程。^② 青少年教育是国外学者关切的议题。他们特别关注海外中国新移民的青少年在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中的适应与融入情况,比较不同文化在教育过程中起到的不同作用。^③ 此外,美国“百人会”(美国华裔百人委员会)发布的华人华侨研究报告,从经济学角度对其在美国的贡献进行量化分析,值得关注。^④

值得注意的是,一开始,国外学界并没有把来自中国的移民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区别开来,因为他们可能尚未意识到中国会在未来发展得如此迅速。所以,他们的做法是,把来自中国的移民作为“亚裔”或“东亚裔”中的一个小群体来讨论。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上升,他们逐渐侧重对“华裔”“华侨”的单独讨论,强调海外中国新移民背后的国际力量,以及他们在跨国活动中对国际社会所作的初步作用。^⑤

其次,国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侧重自然科学视角,不少学者关注海外中国新移民常患的各类疾病及治疗手段,探究“种族”与“疾病”之间的可能关系。贯穿始终的是对流行病学、公共卫生的关注,包括结核病的产生、吸烟行为的影响等问题。早期研究者习惯将海外中国新移民的患病率、死

① Min Zhou, *Chinatown: The Socioeconomic Potential of an Urban Enclave*,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 John Myles and Feng Hou, “Changing Colours: Spatial Assimilation and New Racial Minority Immigrants”,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9, no. 1, 2004, pp. 29–58.

③ Desiree Baolian Qin, “Being ‘Good’ or Being ‘Popular’ Gender and Ethnic Identity Negotiations of Chinese Immigrant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vol. 24, no. 1, 2009, pp. 37–66.

④ Committee 100 and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From Foundations to Frontiers: Chinese American Contributions to the Fabric of America”, *The Economist*, vol. 68, no. 9, 2021, pp. 6–57.

⑤ Lisa Keister and Jody Vallejo and Paige Smith, “Investing in the Homeland: Cross-border Investments and Immigrant Wealth in the U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46, no. 18, 2020, pp. 3785–3807.

亡率同移居国当地人进行比较,这种视角认为,疾病的产生与人所在环境密切相关。^① 研究中,他们时常将海外中国新移民作为流行病发生阶段的“危险因素”来考虑,虽然当前也转向了对疾病防治研究的侧重,但是,正如凯瑟琳·梅森说的那样,“污名化”叙事在公共卫生领域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把种族与疾病混为一谈的情况不时出现。^② 方法上,学者们陆续意识到,早期研究过于关注医院、社区等公共场域,并不能完整地反映海外中国新移民对疾病的处理手段与思维方式,因为受文化影响,海外中国新移民对疾病的认知、治疗体系与西方大不相同,故他们又开始触及研究民族医疗,讨论不同治疗方案对疾病的作用。^③

最后,国外研究十分关注海外中国新移民的精神问题与照护问题,或称“健康”问题,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与健康服务使用等方面。^④ 他们擅长使用量表手法,将海外中国新移民可能获得的社会支持与健康联系起来,研究抑郁、焦虑和其他问题。^⑤ 当前,已经有学者注意到新移民在精神疾病和心理健康方面经历了长期被误解的情况,不过,即便这群人被外界认为患有精神疾病,他们也能够移民内部保持一定的社会地位。^⑥ 海外中国新移民的老年人照护问题也是国际学者热切关注的。他们使用“孝道”“责任”等词语,关注老年群体如何构建社会网络,获得老年幸福,又如何在移居国社区获得护理支持,例如,积极融入所在社区的各类组织,是满足老年人照护需求的重点。^⑦

(三) 国外研究的特点、优势与不足

综合来看,国外研究普遍关心海外中国新移民是如何被同化的,如何在同化的过程中对移居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影响,又是如何发生更为复杂的变化。总结上述议题,国外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特点、优势与不足:

第一,在研究学科与范畴上,国外研究覆盖面十分广泛,涉及了海外中国新移民的身体、心理到文化的各方面,尤其在医学层面的研究成果颇多,大大丰富了实证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但较为分散的学科不利于研究对话与共鸣。同时,国外研究对海外中国新移民总体性、宏观性的概述与分析较少。在关注地域上,国外研究集中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缺少新兴移民国家的情况,这与检索文献限制在英文文献有关。虽然有少量学者关注到,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海外中国新移民流向发生了改变,但国外学界反应并不及时。

第二,从研究方法和认识上,国外研究多采用量化方法,对某个社区的海外中国新移民进行问卷抽样调查,再对数据进行分析解读,而深入社区并展开追踪研究较少,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或中文掌握不到位所导致的。他们极为注重“跨文化比较”,特别喜欢把来自中国的移民与韩

① Steven Stellman and Qing-Sheng Wang, "Cancer Mortality in Chinese Immigrants to New York City: Comparison with Chinese in Tianjin and with United States-born Whites", *Cancer*, vol. 73, no. 4, 1994, pp. 1270 - 1275.

② Katherine Mason, "Epidemiologizing Culture: Scaling Chineseness through Narratives of Stigma in New York Cit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vol. 35, no. 1, 2021.

③ Jennifer Leng and Lei Lei (et al.),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oncurrently with Conventional Cancer Treatment Among Chinese Cancer Patients", *Journal of Immigrant and Minority Health*, vol. 22, no. 6, 2020, pp. 1240 - 1247.

④ Talya Salant and Diane Lauderdale, "Measuring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Acculturation and Health in Asian Immigrant Population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 57, no. 7, 2003, pp. 71 - 90.

⑤ Xu Ling and Chi Iris, "Acculturative Str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Asi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oles of Social Support and Negative Interaction", *Asia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4, no. 3, 2013, pp. 217 - 226.

⑥ Lawrence Yang and Fang-pei Chen (et al.), "What Matters Most: A Cultural Mechanism Moderating Structural Vulnerability and Moral Experience of Mental Illness Stigm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 103, no. 2, 2014, pp. 84 - 93.

⑦ Christina Miyawaki, "Caregiving Attitudes and Needs of Later-generation Chinese-American Family Caregivers of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vol. 41, no. 12, 2020, pp. 2377 - 2399.

国或日本的移民进行比较,形成对东亚移民的整体认识。^①但许多“跨文化比较”研究并没有真正落地,因为当我们认真审视这些学者的成果时会发现,多数学者仅是以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时间段的移民来代表所有来自中国的移民,忽略了内部的异质性与阶段性,使得研究碎片化,深度较为不足。

第三,在研究理论和立场上,早期的国外研究大多带有明显的理论预设。研究者更乐意看到海外中国新移民在移居国的“新变化”“新认同”,这是因为他们在开始研究之前,已经对海外中国新移民的移民动机下了判断——经济因素是移民的核心原因,移民们从收入较低的地方迁入收入较高的地方,移入国的经济地位远高于移出国,故政治、文化地位也高于移出国。目前,这些早期观点已经在海外学界发生了一定的视角转换与反思,因为,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这样的立场与方法很大程度上存在对海外中国新移民群体“污名化”的偏见。在此,学者洪宜安对“唐人街”研究的总结恰好可以说明该情况。她认为,唐人街虽然不再是贫民窟和异类的代表,但现在,它又被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在国际竞争和中国力量凸显的形势下,被看作是“机遇”和“威胁”的混合体。^②这一观点的转变,反映了国外学界对海外中国新移民看法的改变,更暗含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看法的改变,隐藏着政治性的话语,是我们研究时必须关注到的。

二、国内研究的主要议题与特点

国内关于海外中国新移民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国内研究多是从移民史的角度进行文献梳理,将海外中国新移民看作是华侨华人史的一部分来描述。学者们注意到了海外中国新移民这一群体的出现,但并没有引起足够关注。随着中国对外发展战略改变,海外中国新移民的数量有了巨大增长,才引起国内研究的重视。国内学者开始认识到,只是研究移民历史,已经难以满足社会对该研究的期待,于是,国内研究逐渐从历史学转向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出现了一定的现象分析,研究进入发展期。特别是2007年,研究达到一个小高峰,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影响到海外中国新移民的发展,发文量有所回落。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和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再次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发文量有所回升。

国内学者对此有所注意,他们大多从洲际、国家范围来分类综述,或从社会意义、世界发展等角度综合讨论。为精准分析国内研究的已有成果,我们利用CiteSpace软件制作知识图谱,以“中国新移民”“海外新移民”“大陆新移民”“华人新移民”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高级检索,经人工筛选得出有效数据525篇,时间跨度为1992—2023年,然后导出文献类型“Refworks”格式,再导入CiteSpace软件,绘制国内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最后,将这些高频共现关键词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将频次最高“新移民”放置在最顶端,自“新移民”开始顺时针递减,依次是“华侨华人”“新加坡”“国际移民”等关键词(图2)。

对图2中显示的高频共现关键词进行分析,结合以暨南大学、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华侨大学为代表的中国大陆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组织出版的反映全球华人华侨发展状况的蓝皮书、研究报告等内容,^③可以看到,已有研究传达出三种议题:一是将海外中国新移民看作一个新群体,讨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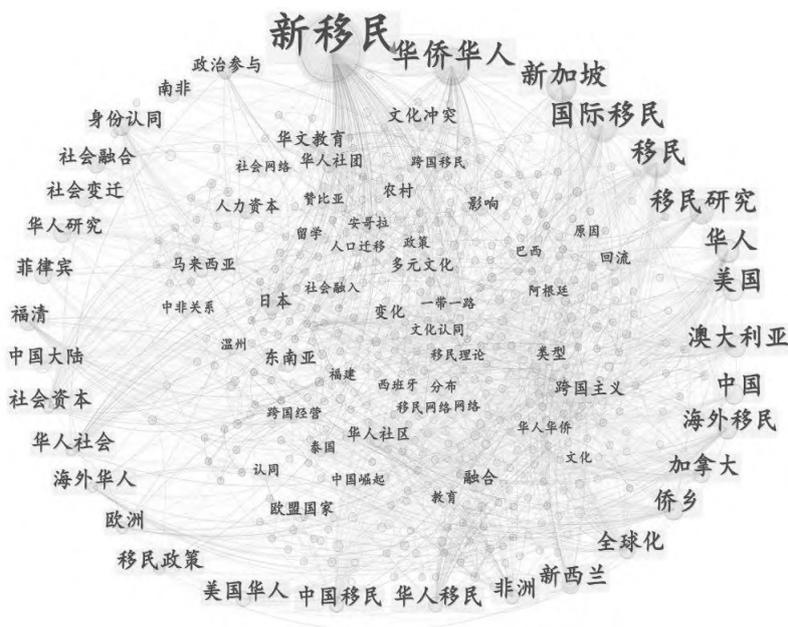
^① Min Zhou and Susan S. Kim, “Community Forces, Soci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The Case of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and Korean Immigrant Communitie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vol. 76, no. 1, 2006, pp. 1–29.

^② Ien Ang, “Chinatowns and the Rise of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54, no. 4, 2020, pp. 1367–1393.

^③ 如《华人华侨研究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世界侨情报告》等综合性研究成果。

内涵与特征,如“新移民”“华侨华人”“国际移民”“华人”这些表示群体的关键词;二是基于对海外中国新移民不同流向的关注,深入探讨他们在不同移居国的生存、发展与移民心态,如“新加坡”“美国”“新西兰”“非洲”,以及“社会变迁”“社会融合”“身份认同”等关键词;三是站在全球化与世界性的角度,从国际形势变化、中外关系变化和国家政策变化等大方向上,把握海外中国新移民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贡献与作用,如“一带一路”“跨国移民”“中非关系”等关键词。本节将基于CiteSpace软件分析的结果,结合其他数据库如读秀、万方等没有被软件分析到的文章与著作,阐释国内研究的主要议题。

图2 1992—2023年国内研究海外中国新移民的关键词共现图^①



(一) 综合分析为主的移民群体新特征

中国的海外移民历史悠久,1949年后移民潮有所停滞,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再次获得迁徙海外的机会,“新移民”逐渐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这一名词概念,最早是由中国相关部门自己提出的,指的是本国近年来移居海外的公民,其时间界定在改革开放以后。^②数量上,1978年后海外中国新移民大幅增长,阶段性变化明显。有学者依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统计数据研究发现,1980—1990年,海外中国新移民数量约230万人,增长约5%;1991—2000年,数量增加到343万人,增长近50%;2001—2010年,人数再次增加了近300万人,增长比例有81%,这是绝对存量上升速度最快的十年;2011—2020年,又增加了150万人,截至2020年,存量达775万人。^③由于统计路径的不同,另有1000万人之说。^④无论以哪种数据为标准,都可见数量和规模的大变化。

国内学界基于时代变迁、制度更替、国力强弱对比、思想观念更新以及国际环境巨变等社会背景,从分布地理、人员类型、发展阶段、发展渠道等角度分类,对“新来源地”“新目的国”“新类型”

①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② 王庆武、程希:《新移民:何以新?为何新?》,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③ 邱玉鼎、段成荣:《1960年以来中国国际移民的变迁——以移民存量与目的地为主的分析》,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4期。

④ 张秀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来移民的发展变迁》,载《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87—116页。

“新通道”“新互动”“新生代”等做了细致研究,列举如下:

其一,“新来源地”,近代迁移海外的中国人主要来自沿海和边境地区,改革开放后,除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仍是移民数量最多的省份外,其他内陆地区陆续出现不同规模的海外中国新移民,来源地呈大分散和小集中的特征^①;其二,“新目的国”,除北美、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发达国家持续成为海外中国新移民的主要聚居点外,部分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也成为他们偏好的地方;其三,“新类型”,出现了留学移民、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家庭团聚移民、婚姻移民、劳务移民和再移民等情况,^②他们多数是主动移民;其四,“新通道”,他们与祖籍地普遍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成为架起中外友好关系的桥梁^③;其五,“新互动”,他们与移居国的当地人互动模式变化明显,特别是通过商业、科技、金融、教育等新兴职业,产生了新互动渠道^④;其六,“新生代”,由于海外中国新移民的文化程度普遍高于老移民,新老移民代际交替明显,这一点凸显在女性群体中,女性除了以“家属”身份随迁之外,更多地以独立移民身份实现跨国迁移,甚至在美国、新西兰等国,男女移民的性别比例已基本相当。^⑤

海外中国新移民中的少数民族特征值得一提。该群体具有“边境移民”的特点,大多定居在中国的周边国家,文化传承与认同情况十分复杂。对他们的研究,能够一定程度增进对我国边缘地带多元民族共生共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族群与国家认同研究。^⑥因此,不能只是“将每个民族作为单体来研究,而忘记了民族之间形成的关系体”,特别是要看到每个民族作为中华民族成员所具有的共通性的一面,以及与中国社会的关联。^⑦

(二) 田野调查为基础的适应融入情况

“新特征”指向新移民们在不同国家聚居产生的“新心态”。本文认为,当海外中国新移民前往不同的国家时,他们必须回答以下问题:我为何要去这个国家?我是否要坚持保持自身的文化身份与民族意识?我是否要融入当地社会,还是保持短期的候鸟与过客心态?所以,若要准确回答上述问题,就必须深入探索他们在移居国的适应、融入与认同等。

近二十年来,大陆学者远赴海外开展了系列田野调查,取得一定成果。总结热点调查地域,近年来有较大转变。使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直观展示调查点的演进脉络。图谱显示,21 世纪初,研究地域重点围绕美国、欧洲、新西兰、澳大利亚等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进行;2010 年前后,热点地域转向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同时,对非洲地区的研究开始出现;近几年,又开始向中低收入国家倾斜,关注赞比亚、安哥拉等国家,与此同时,日本、西班牙等国的海外中国新移民研究也有所呈现。

从热点调查地域的转变中可以看出,海外中国新移民虽然一直持续着迁移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但其心态有所变化,适应和融入大不相同。早期研究延续着同化论(又称熔炉论)和文化多元论等传统观点,近几年的调查结果表明,他们在移居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影响力逐步提升,对比老移民,他们期望更积极地拓展社会资源,通过参加教育机构、建立各类社团,在经济层面获得较大成功,但在其他方面,则融入程度一般。^⑧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出现了类似“泛

① 庄国土:《全球化时代中国海外移民的新特点》,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 年第 8 期。

② 张秀明:《21 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与特点探析》,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 年第 1 期。

③ 赵红英:《试论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特征——北美与欧洲的比较》,载《八桂侨刊》,2001 年第 3 期。

④ 任贵祥:《近代与当代两次移民潮比较研究》,载《史学月刊》,2002 年第 9 期。

⑤ 张秀明:《国际移民视野下的华侨华人》,载《青海民族研究》,2023 年第 1 期。

⑥ 陈志明:《一带一路、中亚与海外华人研究》,载《青海民族研究》,2018 年第 1 期。

⑦ 丁宏、马宏:《海外民族志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载《贵州民族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⑧ 刘蕾:《海外学者视域中的意大利华人移民:以普拉托为例》,载《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 年第 12 期。

华人认同”的说法。^①李明欢总结了新移民流向发达国家的心态转变,即从早期无奈的“落叶归根”,转型为近代的“落地生根”,21世纪后,随着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广泛扩展,再次转向“逐梦留根”。^②

近几年来,“南南移民”的调查成为关注热点,大量的海外中国新移民流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调查显示,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尚未形成领先欧美国家的移民吸引力,所以,近年来前往这些国家的海外中国新移民,许多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国企员工、投资移民或商贸移民,他们共同组成了以中国企业为核心的“雁阵迁移格局”。^③并且,他们一定程度上,采取了回避和不融入的策略,在移居国构建起“过客”心态。^④这种新生存模式、新移民心态,既不稳定也不简单,因时因地而异,透露出所隐含的国际政治复杂性与多面性。

调查祖籍地即侨乡研究(又称原乡研究),成为有别于国外研究的重点之一。一方面,国内学者主要从移民与侨乡的关系入手,采用“移民网络”理论,^⑤认为这层“关系”是社会资本,他们可以通过与侨乡紧密沟通所建立起来的跨国网络与人情互惠,获得操作移民及获利的能力,最终使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文化乃至政治资本。^⑥另一方面,对祖籍地的影响也受到关注,学者们重点围绕中国东部、东南部各省的传统侨乡进行调查。^⑦若进一步分析,海外中国新移民与祖籍国、国际社会的关系,实则因中国侨务政策和西方对华政策的变化而受到影响,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侨务公共外交为新移民创造了侨务资源,^⑧而西方不同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也使得新移民的历程和生存状态变化显著。^⑨

此外,多国适应融入情况的比较性调查也有所涉及,一是针对不同国家新移民的现状进行横向比较,如周敏等人对美国和新加坡两地的新移民子女教育研究^⑩;二是在同一国家内,将海外中国新移民与其他国家的移民来比较,例如不少研究对比了中印两国的移民情况^⑪。总体上,国际比较视野仍在少数,需下一步持续探索。

(三) 全球化时代下的新角色与新作用

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内学界热衷在把握国际形势、中外关系和中国政策变化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海外中国新移民在跨国流动、全球化建设中的新角色、新作用。“华商研究”是这一方面的典型。早期的“华商研究”集中讨论海外中国新移民开设的企业如何积极推动着中国经济向前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形成了“南南合作”框架下的新华商群体,他们利用跨国资源与在地资源,形成“本土化”与“跨国性”的双重嵌入,在国内外建立起稳定的互利共赢关系。^⑫

也有学者关注到高层次人才在流动中的角色与作用,如探讨他们的“回流”情况。因为全球政

① 陈咏媛:《智利华人的民族身份认同及双重世代差异——基于圣地亚哥市的个案研究》,载《青年研究》,2018年第5期。

② 李明欢:《逐梦留根:21世纪以来中国人跨国流动新常态》,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年第3期。

③ 高哲:《安哥拉中国新移民雁阵迁移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

④ 袁丁:《非洲的“过客”:对刚果(金)中国短期移民群体的研究》,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⑤ 刘莹:《移民网络与侨乡跨国移民分析——以青田人移民欧洲为例》,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⑥ 李明欢:《“侨乡社会资本”解读: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⑦ 詹冠群:《现实与历史:新侨乡·新移民·闽籍华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年。

⑧ 林逢春、谢秀英:《海外华侨华人在侨务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定位与实施路径》,载《理论月刊》,2014年第7期。

⑨ 常夷:《1965年后美国对华移民政策与中国大陆新移民研究》,载《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4期。

⑩ 周敏、王君:《中国新移民的教育期望及其面临的挑战、制度限制和社会支持——以美国和新加坡为例》,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⑪ 例如比较两国移民在同一地的结构数量、与祖籍国的经济联系、职业发展等情况。参见张丽娜:《澳大利亚中印移民结构数量对比研究》,载《八桂侨刊》,2014年第4期;李涛:《中、印海外移民与母国经济联系的比较研究》,载《世界民族》,2011年第3期;周博:《在美华人与印度人职场成就比较研究》,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21年第6期。

⑫ 任娜、刘宏:《本土化与跨国性——新加坡华人新移民企业家的双重嵌入》,载《世界民族》,2016年第2期。

治经济局势进入新一轮波动之中,中国稳定的政经环境吸引了不少高层次海外中国新移民的回流。学者们发现,这些高层次移民的回流地区从东南沿海各省逐步北上,向长三角地区转移。这些人既带回了先进的技术、资金、人才,也推动着国内的理念革新与产业升级。不过,学者们发现,海外中国新移民回流的目的,更多是为了个人与家庭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总体上这种回流模式是复杂的,回流后也有可能再次迁出流动。^①

总体上,海外中国新移民正积极参与塑造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成为中国文化传播和软实力增强的推动力量。^② 曾少聪将海外中国新移民的影响力分为两个时间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他们为投资建设、人才引进、反独促统和国际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他们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到了重要作用。^③ 同时,学界也关注到他们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着共生关系,如陈奕平认为,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多维空间的拓展者、建设者和参与者。^④ 这些观点,进一步指明了海外中国新移民研究的价值追求,也为人类社会应对未来的移民浪潮提供方向。学者们意识到,该群体具有独特资源优势、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应使其发挥语言文化、民心相通和跨国网络等作用。^⑤ 不过,也要考虑到,这些作用的发挥,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国际关系变化、政策调整、侨情变化等因素影响,因此,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并把研究结果运用在实际问题处理中,为全球移民治理和国际关系构建提供指导。^⑥

综合比较国内外研究的异同,学者们都注意到了海外中国新移民的群体新变化,在微观调查和宏观分析上,成果都比较丰富,在理论运用时,都习惯借用已有的经典理论进行分析,适用理论尚未出现较大突破。而国内外研究的不同点在于:第一,研究方法上,国内学者基于语言与文化相通性,开展深度田野调查的情况与国外学者相比较多,而国外学界在量化和大数据分析上有较大的突破,这是国内研究需要加强的;第二,学科范畴上,国内外学界虽然都比较关注移民的社会生活,关心他们的适应和认同情况,但国内侧重从社会科学角度分析,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涉及较多,而国外学界自然科学学科参与度较大;第三,研究旨趣上,国内学者注重对海外中国新移民群体的整体性关注,包括概念、特征和地域等方面的精细解读,分析阶段性变化,而这恰好是国外研究所缺乏的。综合以上特点,国内学界想要走出一条独特道路,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研究展望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历史进程发展出两大基本趋势,这两大趋势明显地体现在国际移民潮流中。一是以资本扩张为驱动轮,并通过经济全球化拓展疆土的趋势;二是以民族独立、民族国家建立、发展为主的趋势。^⑦ 根据这两个趋势,在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后,属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不断向物质、消费和精神生产更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流动。

如今,世界进程又一次变化,资本扩张影响下的现代社会,随全球化所改变,新兴移民聚居地陆

① 陈程:《大陆海外新移民的回流模式与空间特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② 梁在、李远飞:《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空间扩展:中国文化的传播和软实力的提升》,载《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79—192页。

③ 曾少聪、杜璋:《华侨华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地位与作用》,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

④ 陈奕平、关亦佳:《海外侨胞与中华民族多维空间的拓展》,载《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3期。

⑤ 刘芳彬:《华侨华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⑥ 陈斌、周龙:《“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全球移民治理与中国角色》,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⑦ 邵发军:《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载《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4期。

续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人类社会进入新历史阶段。海外中国新移民正是在这种跌宕起伏的世界环境中,不断形成和壮大的。海外中国新移民推动着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人群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一方面,国际社会共生、共融的发展趋势已势不可挡,气候、能源、金融等各领域的共享和依存成为必然,这一背景下,海外中国新移民有力推动着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世界舞台上不断发生着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传统发达国家正竭力遏制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这是国际社会动荡和新旧秩序交替的根本原因,各国的移民政策与国际关系也更为紧缩,他们的生存状态受到较大影响。

面对上述国际社会的共生性和矛盾性,我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单一民族国家无法应对的挑战。马克思强调,“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①。研究者能够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去研究海外中国新移民,从理论、地域、方法、内容上进一步深入,有效探索新移民在海外生存、发展规律,提升本领域研究的地位与影响力。

(一) 复杂变动环境中的理论发展与推进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从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地理学等角度创造了一系列经典理论,推动移民理论从单向研究到双向研究发展:所谓单向指的是古典国际移民理论强调的,从祖籍地到移居国或从移居国回祖籍地的单向行为,重点关注动因、过程和结果这三个节点;双向研究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观察国际性的人口流动问题。^②此外,也出现了“跨国主义”理论,将移民的个体特征、祖籍地发展情况和海外中国新移民裔社区研究都囊括其中。^③

然而,多数理论是基于“双边关系”而言,无论是单向还是双向理论,都不再是“在中国”或者“在移居国”这种非此即彼的研究,而是应该结合国际政治、外交战略等世界性议题、基于世界多边关系的复合性研究。不仅如此,包括“跨国主义”理论在内,大多数理论容易受到“民族国家”这种以国家和文明为中心的固定框架影响,^④使得研究有意无意地带有国家视角,陷入“文明冲突论”的误区。采用这种理论视角的学者,或是将祖籍地的文化与移居国的文化分出个优劣,或是把祖籍国和移居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划分个高低(如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然后,再跨越历史、文化与族群身份,寻找海外中国新移民在异环境中的声音表达,转译他们在聚居时的种种“不寻常”之处。这种情况常见于国外研究者,他们擅长用不易被世俗和常理理解的“叛逆眼光”,灵活部署所有元素之间的关系,以此实现对各种实体、符号、关系和意义的重新配置。^⑤

所以,必须从全球复杂变动的环境中,深刻把握海外中国新移民所处的政治生态。换言之,这些复杂的变动因素究竟对海外中国新移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一,“文明冲突”在全球政治生态中是否仍旧占据主流?其二,各国、各地区的新移民与当地人在经济利益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文化接触上的人文关怀、在安全保障上的共同参与等情况表现在何处?产生的动因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在预设、选择或运用理论时积极思考,要有一个明确的前提,使研究既符合本国对海外中国新移民的认知,也符合中国在世界的高度。

(二) 传统与新兴移民地域的平衡与扩展

研究地域的范围确定是海外中国新移民研究的重要起点。目前研究关注较多的,仍是在世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

② 李明欢:《国际移民研究热点与华侨华人研究展望》,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③ 周敏、黎相宜:《国际移民研究的理论回顾及未来展望》,载《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6期。

④ 梁在、王楠:《中国和21世纪的国际移民研究》,载《学术月刊》,2021年第8期。

⑤ 周大鸣、云娇:《当代美国人类学中国研究的进路分析》,载《贵州民族研究》,2023年第1期。

舞台上活跃着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加拿大、欧洲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际形势、国际投资、国家政策都促使大量的海外中国新移民向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移居,包括非洲、拉丁美洲、中东、中亚等。据统计,2023年我国企业共向境外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4.7万人,比上年增加8.8万人,其中承包工程项下派出11.1万人,劳务合作项下派出23.6万人,2023年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54.1万人。^①此外,还有大量通过其他方式入境的海外中国新移民没有被统计到。这些人带着国内的技术、资源到当地进行大型基建活动,属于国企投资的国家行为,他们与当地政府、企业交往密切,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对外政策要依靠他们实施落地,但是,他们大多移植了国内的管理和生活模式,与移居国当地人的生活比较隔离。因此,他们与当地人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本地人与外来者的关系,他们背后所代表的,还是中国与移居国的关系。正因如此,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使得他们时常听到负面的世界评判和质疑之声。那么,面对这一情况,国内学者要有力地回应这些质疑,就可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体系上考虑,包括海外中国新移民如何在保持独立生存状态时,积极践行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推动实现中国与移居国的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命运共存等话题,这将是一个值得前行的方向。

新的“原乡”以及新的原乡关系也应注意。传统华侨华人研究非常关注福建、广东等传统移民输出地,但是,他们在开展此类研究时,依旧把海外中国新移民看作“我者”,分析的是“我与他”的点对点关系,考察海外中国新移民是否对家乡做出建设、贡献多大。新出现的“原乡”,在其输送的移民类型,以及回馈、回流的作用大不相同。因为这些新原乡大多是东西部的一线城市,他们的发展依靠的并非传统“移民汇款”模式,留学生占到了极大比例。另一些新原乡,如义乌一类的依靠新型国际贸易而形成的原乡,海外中国新移民发展模式更不一样。所以,下一步需要对这些原乡进行划分、探查和比较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再移民”的情况,以往关注再移民,多是从历史学角度考察的代际发展问题,忽视了他们出国后的再选择、再流动,抑或回流后的再迁移。一般来说从东南亚再迁移到欧美国家的再移民数量较多,这些“再移民”的动机、路线、类型、生存、融入都与通常意义的海外中国新移民较为不同,他们如何融入和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值得关注。

(三) 田野调查与多元方法的结合与革新

研究方法上,首先是开展大范围的田野调查,以此准确把握新移民群体不同维度的结构特征与资源优势。所以,必须综合统筹各方力量与资源,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调查体系。调查中积极联合在不同国家成立的新移民社团组织机构,最大限度整合资源,保障大范围调查的可行性、深入性。

其次,可以关注来自世界各国的大数据统计,并注意更新运用数据的研究方法。尽量从多渠道收集、整理存量数据。通常,人们首要选择官方渠道公布的数据,如国内历次的人口普查,中国移民管理局的年度数据,以及每年出版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留学发展报告、华侨华人研究报告等。国外的统计数据也非常多样,如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NGO组织的年度统计报告。许多传统移民大国习惯在各个渠道公布本国的移民年鉴,例如美国国土安全统计办公室(OHSS)每年在其官方网站上,向全世界公布当年取得永久居留权、临时入境、申请避难或以难民身份入籍的外国人数数据,^②其中包含来自中国的移民。国内已有学者开始基于这些数据构建移民引力模型,分析影响海

^① 《2023年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简明统计》,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24年1月29日,<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2401/20240103469618.shtml>。

^② *Yearbook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公开自1996—2022年的相关数据,载美国国土安全统计局网站,<https://www.dhs.gov/ohss/topics/immigration/yearbook>。

外中国新移民流向何处的因素。^①

最后,运用流量数据,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交通条件、信息技术和移民交往空间剧烈变化,海外中国新移民的网络交往和活动轨迹有时很难从现实上判断,于是有研究者开始从虚拟空间中抓取民众的网络行为,并进行量化研究。例如,有学者发现,在雾霾天时人们在搜索引擎上搜“移民”的数量会增多,说明环境污染与移民动因有一定关联。^② 互联网人类学的兴起对海外中国新移民研究也是极为有利的,它能够很好地探查到不易被看到的网络世界的内容,也可以消弭学者与被调查者的现实距离,减少介入的界限,为研究构建起一个跨时空的、开放的、极富活力的世界。^③

(四) 世界文明互鉴中内容的整合与拓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指血缘、地缘共同体带来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更指情感、利益、安全共生共在的全球共同体。当前,国内外研究大多只关注“共同体”的某一面,如国外研究对疾病、体质的关注是侧重以血缘、种族为基础的共同体,国内的侨乡研究则关注地缘、业缘为主的共同体。所以,国内学界应从整体观出发,基于“文明互鉴”的角度进行整合与拓展。

一是在内容上加入国外研究如心理学、疾病学、老年学等范畴,并将此前多被忽视的安全、环境、人道主义等问题囊括其中。其中,移民治理是文明互鉴与合作共赢的桥梁之一。中国作为全球大国,正积极参与国际移民治理机制、构建多边移民治理理念,随着中国参与程度上升、角色凸显,相关连锁效应将进一步呈现在海外中国新移民身上。学者关注他们,就必须关注到中国在全球移民治理上的这一参与,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危机共克、荣辱与共”等理念,在研究内容中挖掘海外中国新移民在经济利益、政治风险、环境危机、文化冲突等治理内容上所承担的贡献与作用。

二是在调查对象上需大范围拓展。目前多从表象的、容易被看到的经济利益谈起,观察和访谈的人,也是那些最易被关注到的、活跃在经济政治舞台上的、受众人欢迎和凝视的一小部分人,还有更多的不同教育水平、不同生活层次、不同地域的海外中国新移民,没有被观察到。此时,需在观察中将不同背景、场域和代际的移民进一步比较。例如,不少的华裔学者对移居美国的新老移民进行了比较,从他们的聚居模式来看二代移民的发展,这一方法可以有效地借鉴和扩展。^④ 同时也需持续观察海外中国新移民中的少数民族,他们成为近年来的新兴研究对象,部分民族学者聚焦与我国毗邻而居的少数民族新移民,包括“海外回族”“海外苗族”“海外藏人”和“海外维吾尔人”等群体的文化互动情况,积累了一批社区调查成果。不过,该角度的研究者较少,学科背景也不够多元,需持续跟进。

四、结 论

未来十余年将是海外中国新移民研究蓬勃发展的时期。为了更好地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这一群体,国内外学界已经从不同维度探讨了他们在海外的生存与发展规律,彰显了海外中国新移

^① 董桂才、马云缠:《中国对外移民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修正零值国际移民引力模型的分析》,载《人口与经济》,2016年第2期。

^② Yu Qin and Hongjia Zhu, “Run Away? Air Pollution and Emigration Interests in China”,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vol. 31, no. 1, 2018, pp. 1–32.

^③ 周大鸣:《互联网研究:中国人类学发展新路径》,载《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0期。

^④ 参见:Zai Liang, *From Chinatown to Every Town: How Chinese Immigrants Have Expanded the Restaurant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3。

民研究与与时俱进的学术魅力与活力。若重新审视海外中国新移民,将会发现,这是一个复杂性和异质性十分明显的群体。在过去,国外学界认识来自中国的移民,要么将其作为片面化认识中国的工具,要么把调查结果预设成一种刻板印象,这些观点如今在国外研究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若要形成一套研究海外中国新移民的“中国经验”,就必须认识到国外研究的经验与不足,在理论、地域、方法、内容等方面不断革新,同时根据当前国际形势,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多维关系。海外中国新移民根植于中国厚重的文化色彩毋庸置疑,离开世界的影响谈海外中国新移民研究也绝无可能。当前海外中国新移民研究所面临的,不仅是研究对象本身发生的巨大变化,也是中国国际地位巨大变化后带来的种种新问题和新的挑战。

回到研究的核心,海外中国新移民研究可以围绕以下三个疑问进一步开展讨论:当“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多维联通的“共同体”,面对“全球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如何理解海外中国新移民在变局中的存在?又如何以这种存在为前提,看待他们在各地的生存与发展,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各方面影响?最后,如何通过海外中国新移民的发展规律,团结动员并引导他们发挥语言文化、民心相通、跨国网络等资源优势,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和世界各国在各领域交流合作牵线搭桥,为世界合作共赢作出贡献。如今,海外中国新移民研究逐渐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可以预见,本研究不仅会继续成为国内外多学科关注的热点,其本身也会创造综合性、世界性的影响力。它将在继承旧有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时代价值,成为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也会体现出它的应用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丰富多彩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案例。

Abstract “New Chinese overseas immigrants” refer to the group that emigrated from China's mainland after 1978, who have a strong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The foreign researches on this group mainly use quantitative methods to conduct extensive discussions in the fields of public health, sociology, psychology, etc., with fruitful results. Whereas, domestic researches are good at holistically sorting out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oup, and focus on learning, through field research, thei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laws as well as their influenc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f immigration.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from foreign experience and in the light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domestic academia needs to provide rich theoretical analyses and case studies for China to better handle and solve relevant problems by innovating and extending research theories, contexts, methods, contents, etc.

Keywords New Chinese Overseas Immigrants Population Mobil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elt and Road”

(周大鸣,教授,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昆明,650500;陈雪,博士研究生,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重庆,400715)

[责任编辑:邓颖洁]